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繁复的中国旋律：现代的诗、现代的文学和现代的文化 /李怡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ISBN 7-80109-465-4

I. 现... II. 李...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8488 号

## 现代 繁复的中国旋律

---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mail: cctp\_edit@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2.8

版 次：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定 价：22.00 元

---

# 目 录

为了再一次出发(代序) ..... 钱理群( 1 )

引论 现代 :繁复的中国旋律..... ( 3 )

## 第一辑 变革与保守 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翼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 (15)

吴宓文化理想的悲剧性 ..... (39)

承传与择取 :面对传统的两类知识分子..... (49)

——鲁迅与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文化之比较

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 ..... (69)

老舍与中国生存文化的现代化 ..... (89)

## 第二辑 古往今来 现代新诗艺术的多重奏

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进程..... (107)

中国现代新诗艺术自觉的传统渊源..... (127)

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143)

|                              |       |
|------------------------------|-------|
| 现代进程中的中国新诗三题.....            | (159) |
| 绿原 :从“童真 ”到“莽汉 ”的艺术史价值 ..... | (166) |
| 艾青 :中国传统的“弃儿 ”与叛逆 .....      | (177) |
| 穆旦 :黄昏里那道夺目的闪电 .....         | (188) |
|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           | (210) |
|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 (229) |

### 第三辑 地域 特殊的现代感受

|                         |       |
|-------------------------|-------|
| 现代四川作家群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 | (251) |
| 巴蜀文化的 20 世纪解读读者 .....   | (262) |
|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        | (285) |
| 研讨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两个问题.....   | (304) |
| ——从郭沫若与乡土文化所想到的         |       |

### 第四辑 思想与学术 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阐释

|                             |       |
|-----------------------------|-------|
| 王富仁与中国 20 世纪晚期的启蒙文化思潮 ..... | (311) |
| 王富仁的“九十年代 ”.....            | (330) |
| 刘纳 :历史的意义与学术的魅力 .....       | (342) |
| 新时期十五年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      | (348) |
| 2000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  | (375) |
| 后 记 .....                   | (399) |

# 为了再一次出发(代序)

钱理群

“为了再一次出发”，这是李怡在回顾“新时期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时说的一句话。我读了收入本书中的大部分篇章，不时为几乎处处可见的闪光的论述而感到惊喜，这一点与王富仁先生当年读李怡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时的感受，颇为相近，这大概不是偶合。

但当我读完文稿，掩卷默想时，跳出来的却只有这一句话。

这句话让人怦然心动，浮想联翩。

我首先想起的，是许多现代作家、现代诗人笔下，都曾出现过的“向远景凝眸”（沈从文语）的神态，以及“飞向天边外”的欲念——李怡自己也说，他是怀着向着“未来”的“冲动”而发出“再出发”的心的召唤的。

这正是让我感动的：在这里，学术研究（不仅是诗歌研究）成了一种永恒的追求，其间有着生命（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者自身的生命）的涌动，是“不断发现，不断创造”的内在生命的欲求，构成了永不止息的研究热情与冲动。这也就是老一辈诗人、学者林庚先生所说的，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是“向着无限”的，它的全部意义、价值与无穷魅力、趣味，就在于它永远在“像新生儿一样，去发现永是新鲜、永是生动、永是陌生的宇宙、人类、社会与自我”。——这正是学术研究的“诗性”之所在。

而这样的“诗性”，却被人们过分轻率与轻意地抛弃了。

当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趋向职业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研究工作逐渐成为可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专业行为,这一方面促成了研究的精密化、科学化,但同时也可能(自然不是必然)使研究成为纯粹的“学术操练”;人们像熟练地摆弄机器一样,纯熟地操作学术,结果生产(往往是不断重复的“批量生产”)出来的,是一些看起来“吓人”而“迷人”(凡学术规程上规定有的无不齐备),但仔细考察却对研究对象并无(或很少)新的发现的“漂亮的纸花”,这样的“无魂的研究”是手段变成目的所结出的苦果。

当现代学术研究与现代文化市场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研究工作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商业性的行业,这一方面为研究成果的传播,社会接受与向实践的转化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并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推动力。但它同时也孕育着学术研究完全商品化的危险,人们同样将手段变成目的,热衷于“学术包装”,进行五花八门的各种内容“组装”(就像玩弄“魔方”一样)与外观“装潢”,制造虚假的繁荣,对学术却无实质性的推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泡沫学术”与“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

事实就是这样的严峻:当人们追求“学术现代性”时,却往往忽略了可能产生的负面的后果,对确实存在的“学术陷阱”缺乏必要的警惕。而这也正是我这几年来一直感到忧虑的,但我又确实知道自己的这些担心,在人们的眼里,不过是“杞人之忧”,因而不免时有寂寞之感。这就是李怡的一句“再一次出发”,竟让我感动、感慨不已的内在原因。这年头,要觅得知音,实在不易。李怡毕竟是年轻人,他的无所顾虑的一声高呼,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好像是毛泽东的话)。学术研究更要有“精神”,多少具有浪漫色彩的“学术诗性”的追求(一些人因此断定它是过时的),应该为现代学术研究所吸纳,它至少可以对前述形式

的“学术”与“包装学术”起到制约的作用。对诗歌(包括现代新诗)的研究尤其不能没有研究者的诗人般的激情、灵感与灵性。

“再一次出发”这句话,又让我想起了诗人绿原的一个著名诗题:“终点,又是一个起点。”这是对已经走过(到了“终点”)的历史路程的肯定——它成为“再出发”的一个基本前提,更是一种批判式的审视,如李怡所自觉到的那样,在其已有成绩、“繁荣景象”的“背后”,去发现“缺失”,这才会产生“再出发”的冲动。于是,“终点”变成“起点”,“起点”再出发走向“终点”,又成为新的“起点”……如此构成了一个永不停顿、生生不已的学术研究的生命之流。

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永不自满”的精神,正如鲁迅所说:“多有不满意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不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而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自我感觉都普遍地过于良好,却又偏偏少有鲁迅这样的危机意识。因此,当看到李怡如此认真地检讨新诗研究的“缺失”,我不由得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并且逐渐打消了一个不便明说的隐忧:这个年纪轻轻就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李怡,会不会就此满足起来,以至重蹈许多人的覆辙,“处女作即是顶峰”,再也没有后劲了呢?现在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杞人之忧”:李怡对新诗研究的不满与批判其实是更对着自己的,或者说是把自己“烧”在里面的。这种自我批判(怀疑、否定)是更加难得的。不过,我仍希望,批判与怀疑能更彻底一些,对自己所提出的“走向现代诗歌本体”的目标与主张,在充分论证它的合理性、必要性的同时(应该说李怡的论述相当精辟,我也是大体同意的),是不是也可以对之作出某种置疑,揭示出可能存在的困惑与“陷阱”呢?这样的“逆向思考”的思维方式,本是鲁迅开创的,但并没有被继承下来,以至我们今天仍习惯于作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的论断。在更年轻的李怡这一代研究者这里,能不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呢?

而且,批判与自我批判,都是要有胆识的,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见识与眼光。首先必须对研究现状有一个科学的估价:看清楚它“已经达到”的水平——这将是“再出发”的基础。更要看准并抓住确实存在的问题的要害——这才能找到“再出发”的突破口。在这些方面,李怡在理论与研究实践上都作了很好的努力,在我看来,沿着已经选定的目标、道路走下去,他是会对自己的研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似乎不必再多说。

然而,我还想强调一点:要真正对新诗研究(以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有一个大突破,包括对自己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必须要有新的知识结构,要有新的想像力与新的创造力。没有这三个方面的超过前人的大的突进,是不可能开创出新诗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的。在这些方面,我认为,包括李怡在内的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似乎还应该进一步地解放思想。坦白地说,我读李怡(以及我所“看好”的年轻研究者)的研究论著时,在欣赏显而易见的才气的同时,总是感到他们仍被某种“东西”束缚着——究竟是什么,我现在还看(说)不清,而且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被束缚”状态却是处处可以感觉到的。我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够正视这一点。我愿意以鲁迅当年说过的一句话相赠,“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与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而且我还要呼吁个人的独创性。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从根蒂上说,就是个人的。人们经常要求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民族化,科学化,规范化,等等,这都无可非议,但却很少提及文学研究的个人化,这却是奇怪的。在我看来,真正的个人化的研究,是不受时代“趋向”、“潮流”的限制的,更是不可规范、无以归类的。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课题、思路、角度与方法,并且几乎是不可重复的。人们开始时可能因为其研究路数的“野”,以及不可避免的种种疏漏,而不能接受,但这类研究,往往给学术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

新的活力,并显示出创造性生命的魅力。这样“天马行空”的学术境界,是我真正向往的,虽自知此生已不可能达到。仍愿意与或有同感的年轻的朋友以此共勉:让我们一起向着这样的境界,“再一次出发”吧——李怡,你愿意吗?

这篇不像序言的序言,似乎应该结束了。突然又想起前几天看过的《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打动了我,而且与本文的题旨好像有点关系。翻检出来,是这样的意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近年来,近现代学术大师一个个被重新抬出来,从学术积累的角度讲,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青年学人前面的又一道高墙。21世纪中国学术的总体推进还有赖于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努力。”(李庸:《我们怎样越过雷池》)这也就是我想说的:人们总是向年轻人强调,没有继承,就没有创造,这是对的,在这方面本世纪有过惨痛的教训,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但还应该有另一句话,也是不能忽略的:任何对前人的继承都不能代替后来者的创造。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而且只有在创造中才会有真正的继承。时代在呼唤新的思想、新的学术,而这新思想、新学术绝不能是已有思想、学术的演绎、改装(所谓“现代化”处理),而只能依靠几代学人的新的创造。现在,“再一次出发”的自我召唤的提出,表明年轻的一代学者已经意识到并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新的学术使命,自觉地开辟他们“这一代的学术”。——我这才明白,李怡的这本书,为什么竟让我如此兴奋与欣慰。



引论

现代：繁复的中国旋律

## 引论 现代 :繁复的中国旋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现代”的自觉追问远不如这门学科一样的历史久远,汪晖作为这一学科的重要学者,他告诉我们的事实是,直到80年代中期,在他向唐弢先生请教何谓现代文学的“现代”时,唐弢先生也只是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sup>①</sup>

的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界对于“现代”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当我们将自己完全置于启蒙主义思想大潮的80年代,在“现代意识”漫天飞舞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对“现代”这一思想或概念进行全面而冷静的考察,引起中国学术界警觉并高度重视却是在90年代即“现代”及其价值已经遭受到了深刻的质疑以后,当然这种质疑首先并不来自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界,这一源于“现代之后”的西方思想界的声音是经由“新锐”的中国文艺学界及当代文学界的“舶来”后终于对贫瘠的90年代思想产生了重大冲击的。

应当说,这一冲击首当其冲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界,因为支撑着我们现代文学界的思想基础就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完善和自觉的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今天,当这一目标本身都成了问题,那么我们用以判断五四新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标尺就显然是大可怀疑的了,甚至至于,连我们的研

---

① 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1期。

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也因此而变得飘忽不定起来，“重估现代性”思潮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自形成以来的一次学术意义的分化和调整。

正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界对于“现代”的考察与追问并不是来自于这一学科发展的内部，所以尽管这些新鲜的“现代性知识体系”极大地更新了我们固有的认识与思维，带给我们分析既往的文学现象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它始终还是无法克服那种与丰富的文学史事实彼此隔膜的状态，这种隔膜有时或许难以言明，但你却又实实在在地感受着它的存在。比如，随着詹姆斯“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走红，我们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着他的一个重要概念：寓言性。“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sup>①</sup>詹姆斯在文中试图告诉我们，包括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第三世界文学”都可以在“民族寓言”的“政治投射”中获得阐释。不言而喻，这样的思路突出了“第三世界”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同质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寓言模式的具体分析与已经存在的鲁迅小说的一些研究相比较，你就会发现，新的阐释似于并不比旧有的分析更加细致，相反，正如有的学者早就发现的那样，它有时就是以一种笼统而粗疏的方式

---

① 詹姆斯：《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当代电影》1984年6期。

掩盖了鲁迅艺术世界原本存在的诸多微妙、矛盾与复杂,<sup>①</sup> 接着下去,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这样的阐释所带来的“方便”竟然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可以无甚分别地装入到“民族寓言”的划一模式当中,在这样的似乎充满了新意的“混装”里面,文学自身的丰富与差别被一再地牺牲着。

再如,近年来人们谈论得较多的“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差异”理论,显然,将中国的现代性视作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会为中国新文学“审美现代性”的丰富找到更多的也更符合事实的解释。然而结合这几年我们所见到的相关成果,我们却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即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解说并不比我们过去关于中国现代作家彷徨于现代/传统、情感/理性之间矛盾性的朴素的说明展开的细节更多——如果新的解释不是对于研究对象实际状态的更细致的发觉,那么我们的新的建构的新的意义也就开始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我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尽管现代性的理念自身可能涵容着矛盾、悖论、差异等复杂的因素,但借助现代性理念建立起来的文学史观念,却表现出一种本质主义倾向,即把同质性、整一性看做文学史的内在景观,文学史家也总想为文学历史寻找一种一元化的解释框架,每一种研究都想把握到某种本质,概括出某种规律,每一种研究视野都太有整合能力。”<sup>②</sup>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不仅是传统研究中那种不自觉的“现代性的理念”可以带来本质主义的倾向,就是当下的自觉的现代性质疑也在一种新的“现代性知识体系”中掩盖着历史本身的许多细节。

---

① 高远东:《经典的意义——鲁迅及其小说及弗·姆逊对鲁迅的理解》,《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4期。

② 余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1期。

我认为,新的“现代性知识体系”的自觉探询之所以同样掩盖着历史本身的许多细节正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将这样的“知识”认定为西方思想与文学的成果:依然是西方思想与文学的现代发展“给了”我们诸多方面的思路,然后我们循着这样的思路再返观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于是也就“发现”在我们这里“同样”出现了对于“世俗现代性”的追求,也出现了“审美现代性”对于它的批判,两种现代性及其矛盾似乎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性知识体系”观照下呈现出来的形象。我以为,这样的阐述区别于过去研究的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为“世俗现代性”追求下的一些文学现象(如通俗文学)以及“现代性矛盾”心态的文学现象(如旧体诗)进入文学史打开了大门,然而却不是完全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传统”出发对于实际现象的概括与认识,这样,我们的新的阐释就可能与我们实际的“传统”取着某种“隔膜”了。

这一可疑的思路还最终体现在我们对“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的追寻方式上。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读到的关于“现代性”概念的描述都几乎无一例外地重复着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洞见如何影响了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对于启蒙和现代性的理论批判,启发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现代性的思考,就“现代性”概念而言,哈贝马斯所作的语源学考察也一再为我们所反复征引,至少,已经被我们视为明确无误的理念就是:“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sup>①</sup>作为一种学理上的梳理或思想史意义的考辨,对于影响着现代中国学术或思想发展的西方语汇的这类追寻无疑是重要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恐怕在于,当

<sup>①</sup> 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载《学人》第6辑。

这样的思想史的学理化梳理一旦被我们直接“移用”到文学现象的描述当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文学的历史其实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思想的历史,当然更不能等同于理性概念的历史。

中国文学的历史也无法等同于西方文学的历史,而西方文学的历史其实也不能等同于西方思想的发展逻辑。

这里处处横亘着不同精神范畴的差异和分歧,文学则是最难为明晰的理性逻辑框架所吞没的自由精神的运动形式,它常常复杂到所有的既往概念都难以理喻的程度。

只要我们努力返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史现象内部,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作家个人还是文学运动的潮流,都难以用简单的“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思维方式来概括其复杂的“现代”观念。中国现代作家——包括所谓“激进”的五四新文化派和“保守”的“学衡派”都同时眷顾着他们心目中的传统与现代,而且常常在这二者之间彷徨犹疑、难以适从,他们面对“现代”理想的热望很难被纳入“世俗现代性”的模式之中,而缅怀“传统”的幽情也似乎无法统一到“审美现代性”的单纯里。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当许多的西方作家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中建立着自己思想的同一性时,更多的中国作家却缠夹于传统/现代的难以理清的矛盾境界,对历史的“循环性”的体验和渴望“进化”的激情如此复杂的纠缠在一起,我们似乎很难用西方“现代性”的时间概念来加以描述。就文学运动的整体进程来看,我们既看到了“进步”的力量(如革命文学在“先进性”的追求中对所谓资产阶级文学的否定),同时也目睹了给历史“补课”的吁求和“回归”的热情(如人们一再表达的对于“五四”的缅怀)。

1996、1997年中国的现代文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现代文学“近代性”的争论,来自海南的宋剑华、杨春时直言20世纪中国文

学并不具备真正的“现代性”,而处处呈现出“近代性”的特征。我以为,这场争论的意义其实不在名词概念的本身,重要的是争论各方立足于不同侧面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所产生的分歧恰恰向人们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无法用西方的语汇来加以描述的。在西方的时间观念的观照下,它的确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混沌一团,难以分辨,争论的双方都可以找出一堆理由来说明其中的任何一个“特性”,而其实任何一个“特性”也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自身的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有必要深入总结和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现代”理念,这种理念既是“中国”自身的,也是“文学”自身的,也就是说它既不是纯粹西方“输入”的,也不是理性推导的,在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理念之间,要充分考虑到一些学者所谓的“文化间性”问题,<sup>①</sup>或者更进一步,是要从一般的文化选位中探讨更具有本质意义的“空间”问题。<sup>②</sup>

其实,文学意义的存在首先就是一个“空间”的问题,无论对于西方人还是对于饱受生存空间压力的现代中国人而言都是如此。因为虽然“时间”衡量了文学之于历史流程的独创性,然而真正确立其话语“意义”的却是人与人所构成的特殊的空间关系。

正是这种空间关系引导着作家对于特定意义的“发现”,同时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结构中丰富和完善着这种意义的宽度与厚度。一个生存于“后发达时代”的乡土中国的读者将可能比大洋彼岸纽约写字楼里的美国人更细致地感受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于质夫作茧自缚般的心理生理的痛苦以及穆旦诗歌中的反复出现的“被围困”、“被还原”、“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

① 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载《学人》第6辑。

② 王富仁:《时间·空间·人》,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5期。

大约也只有生活于现代中国这个特定的“空间”中的读者面对这样的句子才拥有格外丰富的感觉,做出生动的发言:“年轻的学得聪明,年老的/因此也继续他们的愚蠢,/谁顾惜未来?没有人心痛:/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sup>①</sup> 换句话说,表达着这样的人生感受、书写着这样的文学主题的鲁迅、郁达夫、穆旦等现代中国作家也正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空间”中确证着、实现着自己的意义。同样,对于浮士德的精神攀升,一个浸润于西方文明环境的知识分子就可能比中国的私塾先生表达出更多的理解和共鸣,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虽然生活在中世纪,但他的精神痛苦却无疑属于文艺复兴时代人与人所构成的生存空间。

在空间的意义上,文学的原初追求只能是为了“生存”和为了“生命”,即为了在这一特殊的空间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开拓自己的活动范围(包括探测这一活动的可能的限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鲁迅和许多中国作家所谓的文学“为了人生”这一看似陈旧的话题的深远含义。很明显,现在的问题是,与其将我们的文学研究在越来越抽象的理论模式中带离我们的实际感受,还不如再探我们文学启动的“原点”,让我们首先返回文学需要的人生基点,然后再重新考察现代中国文学的所谓“现代性”,因为,这样的“现代性”的结构本身就只能是中国现代作家为了他们的现实人生、为了在现实人生中争取自我的生存空间、探询这一空间所可能给予他的自由与意义的方式。除此,岂有它哉?

如果我们做一番适当的清理就不难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现代”问题归根结底其实都属于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空间关系问题,诸如京派海派的分歧冲突问题,抗战时期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学追求及后者对于前者的整合所构造的当代文学性质问题,中

<sup>①</sup> 穆旦:《裂纹》。

国作家之于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体验的问题,文化中心与边缘之于中国作家的不同的影响问题,乡土文学与区域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的问題等等,可以说正是这些空间问题构成了中国现代作家其他时间意识的基础,中国现代作家之于传统/现代体验的个体差异都可以在空间的分割与空间的压力差异中获得深刻的解释。较之于过去长期流行的以现代社会历史的分期划分现代中国文学,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于1985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曾经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前者纯粹是一种社会历史时间的定位,而后者则是以新的定位方式传达了中国现代作家随着20世纪到来的越发清晰的具体生存感受——一种较以往的政治性描述更切合“空间”实际的人生体验。<sup>①</sup> 10余年以后,又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而这些质疑所依据的其实也是他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内部表现出来的更具体更丰富的生存感受,他们是为了揭示中国现代作家的更细致更独特的各自空间的体验才试图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做出新的调整。<sup>②</sup>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空间”体验基点相适应,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每一次真正的创新其实并不来自于时间意义的新潮理论的输入,而恰恰是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返回“原点”,努力进入更多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体验空间”,去认识和理解他们各种各样的实际的人生感受。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20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年5期。

② 参阅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2期，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收入《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